

仙居风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共仙居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仙居风云

中共仙居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三月

序一

建文强

仙居县委党史办同志编写了一本书，叫《仙居风云》，是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仙居革命斗争史实的。

仙居是台州西面的一个山区县，地形条件比较好，是开辟革命游击根据地的好地方。这里的人民勤劳俭朴，他们曾受到大革命以来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影响，政治觉悟较高。因此红军挺进师一纵队到仙居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的支持和热情的帮助，如为部队带路，侦察敌情，帮助隐蔽伤病员等等。

红军挺进师一纵队是1935年进入台州地区各县活动的。前后由以朱宝芬、王屏为司令员，杨金山为纵队政委，还有行动委员会书记刘达云等同志率领，到浙东、浙南找当地共产党组织，并以仙居为中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此间，纵横驰骋，几次进入台州各县。

使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在仙永（今仙居磐安交界处）边境的那段经历。大约是1935年秋冬间，红一纵队在与敌人作艰苦斗争中，阵亡的不少，大部分同志因伤住下。当时还有十几个同志能坚持工作，遂由我和刘达云率队，继续寻找地方党的组织，再次来到了仙居西北面的秧田、东坞一带

活动。当地广大群众由于受前几年党组织和红十三军的传统影响，见到我们，说是红军回来了，喜出望外，胜似亲人重逢。他们冒着被反动派扣上“通匪”、“窝藏共匪”的罪名，不怕杀头坐牢的危险，迅速把我们安排住下来，积极给我们带路，侦察敌人活动情况和寻找当地党组织等。终于使我们站住了脚跟，在不长时间内，在仙居、永康、缙云边境开辟了一块游击根据地。

我当时与刘达云分开放工作，我带几个同志就住在豆腐寮。这山村只有一户人家，主人叫李炳贵，妻张小娇，家里没有其他人。我知道主人姓李，为了工作方便，也改名为李炳桂。于是，他们就对我格外亲切，还与我结为兄弟，炳贵年龄比我大，我就叫他为哥哥，叫他妻子为嫂嫂。

此后，每轮到我站岗放哨，炳贵看我辛苦，坚持要替我站岗。他说：“你年轻，晚上爱睡觉，我年纪大，不要紧。”我说站岗不能叫别人代替的，这是红军中纪律不允许的。他执着地说：“我全部家档都在这里，我不怕，你怕什么？！”当我再向他讲明部队纪律严格，谁也不能违犯，如果违犯就要处分的。他听懂了，就提着小火笼（取暖用）陪我站岗。以后，每逢晚上轮到我站岗，他都来陪我。

我们几个队员住在他家，吃在他家。大嫂张小娇不仅每天三餐给我们做饭烧菜，还争着为我们洗衣服。炳贵还特别嘱咐妻子：“要洗干净些，同志们是爱清洁的。”大嫂每次总把我们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

一九三六年过春节时，炳贵家里杀了一只大肉猪。为了改善同志们的生活，刘达云建议，叫我向炳贵借点猪肉。当我向炳贵说明情况时，炳贵说：“借什么？！我家有肉吃，还少得了同志们的份？！你们几个同志都在这里吃，我们共

享吧！”我说自己是负责人，他处还有部分同志（因刘达云带领的驻在胡坦佑地方）也要管。他问我有多少人，我说有十几人。他二话没说，就慷慨地给了一大腿猪肉，钱分文不收。

李炳贵为了我们的安全，从不向外人透露一点风声。因为我们住在他家，他还不让亲戚朋友来串门走亲。

因革命工作需要，不久，我们要转移到缙云、永康县开辟工作。离别时，他们依依不舍，千叮咛万嘱咐，叫我们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得给他们写信。由于当时形势紧张，通信会被敌人发现。为了不使他家遭受意外，因此一直没有联系。直到解放后，才知道张小娇在我们走后不久，就被敌人抓去。尽管敌人严刑拷打，张小娇同志没有吐露过有关红军住在她家活动情况一个字。敌人软硬兼施，黔驴技穷。最后，张小娇慷慨奔赴刑场，英勇就义。临死时，身上还怀着已八个月了的孩子。

事情过去已五十多年了，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心里总是酸酸的。李炳贵、张小娇同志及仙居县的其他群众那种亲如兄弟姐妹般的阶级感情，使我难以忘怀。我们怀念他们，怀念为革命工作作出贡献的仙居人民。陈毅将军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如果我们没有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

因此，我今天还是这句老话，共产党人要无时无刻地想着群众，依靠群众，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到底。为此，我期望仙居县的党政领导紧密地依靠仙居人民，把仙居建设的更好。

仙居县委党史办同志编辑了这本书，用仙居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和艰苦奋斗的优良革命传统教育人们，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在此表示祝贺，并预祝这本书早日与读者见面。

1992年1月22日

序二

郭光兰

我县党史办同志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劳动，在完成《中共仙居县组织史资料》、《中共仙居党史大事记》和《仙居英烈》的编辑发行的基础上，为了配合今年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中共党史和党建理论，又推出了《仙居风云》这本册子。这是仙居地方党史征集研究工作的又一成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仙居这块古老而质朴的土地，曾经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里遍布着革命者永恒的足迹。从“五·四”运动到仙居党组织的建立，从红十三军仙居游击队到红军挺进师在仙居的活动，从反对国民党的“土地陈报”到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三反”、“六抗”斗争，从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到仙居全境的解放。无不记述着仙居人民如火如荼、悲壮卓绝、史诗般的篇章。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仙居人民的革命斗争史。

党史工作是意识形态领域“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前沿的重要阵地之一。国内外敌对势力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否定党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史工作对于反“和平演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可见，在当今国际风云变幻的新形势

下，加强党史宣传和革命传统教育尤其必要，它能起到资政育人 的作用。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要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宣传党的光荣历史，宣传我们党为民族、为人民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要教育全体党员进一步明确我们党目前所处的历史地位和肩负的历史责任。”我们说，在全党开展党史党建理论学习，以学习来推动党的建设，是反对“和平演变”的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学习和研究党史，包括学习和研究地方党史，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观察党的整个历史过程，实事求是地对待和分析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特殊性，宣传党的历史的闪光点和伟大功绩。从而促使人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伟大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其次，要用世界的眼光来学习和研究党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部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史。特别是在当今国际风云变幻，我们肩负着反“和平演变”的历史重任的时刻，我们有责任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的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反击国内国际敌对势力妄图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

再次，要用历史的眼光来学习和研究党史。客观地科学地分析理解党的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把党的每一段历史放到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客观环境中去分析研究，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离开历史条件来学习和研究。要着重总结党在历史中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要总结那些失败的教训。要使人

们从整体上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经验和教训正反两个方面得到启发，认识到革命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认识到革命工作的艰苦性，从而激发人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和坚持党的领导的自觉性。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我们注重历史，十分重要的一条是为现实服务。学习和研究地方党史，其直接的意义就在于使我们能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实事求是地把握地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性和特殊性，把地方党组织建设好，使地方党组织成为地方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核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仙居风云》纪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仙居的活动和仙居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革命斗争风貌。在这本书中，你会看到，当年革命者的足迹还留在你的身边；你会发现，书中记载的英烈就是你的长辈；你会感觉到，今天所走的路就是革命前辈不畏强暴，勇于用生命和鲜血开拓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仙居风云》确确实实是一本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党史党建理论学习辅助材料。这本册子只选用了十四篇专题材料，它不可能详细、全面地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仙居党组织活动的全部过程，但还是多侧面地反映了仙居革命斗争史的真实面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仙居革命斗争史实的最主要部分，是仙居党史工作积十几年资料后而提取出来的精华，值得大家一读。

诚然，历史研究是无止境的。仙居党史的研究还远没有完成，还有许多宝贵的资料有待我们去挖掘、去发现。我相信，有这个小册子为基础，今后通过继续努力，不断积累，不断发现，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仙居地方党史史料呈献给广大读者。

1992年1月29日

目 录

中国共产党在仙居活动梗概	(1)
“五·四”运动在仙居	(20)
国民革命军仙居民军补充团	(26)
中共仙居县中心支部的建立及其 主要活动	(30)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仙居游击队	(41)
仙居南乡农民反对土地陈报 暴动始末	(60)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第一纵队 在仙居	(70)
仙居的抗日救亡运动	(79)
抗战时期的仙居“二五减租”风潮	(94)
仙居抗日武装的组建及其活动	(103)
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在仙居	(112)

仙缙边境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123)
仙临黄永边境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147)
南北干部会师 解放仙居全境	(165)
附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仙居党组织沿革一览表	(182)
抗日战争时期仙居党组织沿革一览表	(185)
解放战争时期仙居党组织沿革一览表	(190)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仙居武装组织沿革表	(193)
后记	(201)

中国共产党在仙居活动梗概

仙居位于浙江东南部的括苍山脉中段，东邻临海、黄岩，南毗永嘉，西接缙云，北连磐安（三十年代为永康）、天台，是台（州）、温（州）、处（丽水）、婺（金华）4地区的结合部。现有面积1996平方公里，人口42万，隶属台州地区。

境内群山连绵，峰峦叠障，山青水秀，早在新石器时代即有部落聚居。《浙江通志》称：“仙固万山中，壁峭岩巉，奇拔称最。”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置县，此后“名已屡更”，但“疆域如旧，不可谓非古县矣！”（《光绪仙居县志》）仙居人杰地灵，历代名人辈出，广大人民富有内反压迫、外抗侵略的光荣传统。

（一）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动统治集团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残酷地剥夺农民，农村中土地、山林不断被封建地主掠夺，大部农民沦为雇农、贫农或佃农。

“土地烧抢”的仙居，“民生凋敝，弦诵间歇”，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劳苦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日趋激化。在此情况下，仙居有许多志士仁人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屡次聚众暴动，挥戈起义。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年间，曾有大批农民起义，配合侍王李世贤率领的太平军攻克县城，建立了政权；

1885年，又有潘小狗等人组织的“哥老会”，毁税卡，惩贪官，反洋教，杀豪绅，攻县城；辛亥革命及反对袁世凯复辟的“二次革命”中，仙居人民曾组织大规模的义军，为打击清政府在仙居的基层政权和亲袁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终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都壮志未酬，未能改变自己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在封建桎梏的束缚下，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仙居仍是落后封闭的传统农业社会，只有为数极少的从事传统工艺的手工业工人，商人寥寥无几，商店屈指可数。全县28万亩土地，占总人口70%以上的雇农、贫农和下中农的占有量仅20%。据1928年6月中共浙南特派员给浙江省委的报告记载，在地主豪绅苛重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之下，仙居“工人工资每天仅1角”；“乡间佃农、贫农生活极苦，食米靠黄岩、临海运入，米价每元（银洋）九升（每升为1.5市斤）”，他们以“食甘薯、芋头、青菜、糠麸”为主粮。人民除受反动政权的压迫外，还受神权、族权的压迫，“氏族界限极深，豪绅及地主的冲突关系多在封建宗法社会观念上，为争封建势力，各氏族之间常发生械斗。”劳苦大众被族首驱使为宗族斗殴丧命以及被地主豪绅催租逼债而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常有发生，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1919年的五四运动，犹如一声春雷震撼着中国沉睡的土地，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爱国学生的宣传启蒙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仙居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觉悟日渐提高，激起了对革命的向往，为开展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初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

一新。她使具有光荣革命传统、通过五四运动觉醒振奋起来的仙居人民在沉寂黑暗之中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的影响下，他们为了摆脱几千年封建统治，砸烂缠在身上的封建桎梏和锁链，毅然走出家门，投奔革命。1924年，热血青年、上张乡米坑村农民张大牛等率30余人，不远千里，前往中国民主革命的发源地之一——广州，投奔革命军，拿起枪杆子，献身革命事业。1927年初，北伐军进军浙江时，拥护革命的城关王镇乾等积极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国民革命军仙居民军补充团”，开赴北伐前线，为北伐军补员，充分表现了仙居人民的革命热情，为北伐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年3月，在浙江省立第六中学（俗称“六中”，下同）就读的仙籍学生王焕忠，由中共临海特别支部书记戴邦定和支委张崇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娄明文等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他们返回仙居，向仙居人民传播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革命道理，为党在仙居建立组织打下了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二）

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中国往何处去？革命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的最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冲破白色恐怖统治的高压，在黑暗的中国夜空，独立高举起反帝反封建

革命的光辉旗帜，领导人民投入了新的战斗。

同年9月，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指派张伯渐任中共临海县委书记，组建了中共临海县委；同月，张即指派仙居籍党员王焕忠返仙秘密发展党员。王焕忠返回家乡后，首先在城关地区开展工作，是年冬，发展了失学青年徐志喜（徐志）、马锦梅、朱寿喜和手工业工人卢金潘、杨永彩、吕汝湘，以及官路的张培马等7人入党，在仙居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种子。与此同时，恰遇国民党在仙居筹建农会和工会，为了掌握这两个群众团体的领导权，王焕忠争得了县农会筹备委员会负责人的席位，指示手工业工人中的党员推荐卢金潘为县工会主席，从而取得了合法身份，并在仙居县平民习艺所组建了我党领导的细木工会，为我党领导工农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年11月，省委浙南特派员在临海向台属各县的党组织负责人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临海县委为了尽快地发动农村的革命斗争，于1928年1月指派林迪生（化名俞若山）为仙居农运特派员，前来开辟工作，领导仙居农民运动。林与王焕忠接上关系后，继续吸收了几个党员，于3月间，建立了共产党在仙居的第一个组织——中共仙居小组，林迪生担任组长。党小组建立后，布置党员分头下乡，在普遍发展和建立农民协会的同时，物色建党对象，壮大党的力量，自此，建党工作在全县展开。5月，首先在城关建立中共仙居支部，接着在全县建立起10个支部，党员发展到200余人，并建立起城区、西乡两个区委，城区区委由马锦梅任书记，西乡区委由张培马负责。

1928年5月，省委指派的浙南特派员世仁（管容德）在临海

召开临海、天台、仙居、黄岩4县党的联席会议。会上，分析了台属各县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党的工作情况，作出了组织问题决议案，要求“在闭会后半个月内，由（各县）负责同志召集全体扩大会议，切实产生县委”，“改造区委和支部，切实纠正过去和平发展的错误”，使“工农军的组织从经济斗争转向游击战争”。

仙居党组织负责人林迪生和徐志，为了贯彻落实联席会议精神，于6月在城关东河塘油车召开筹建县委的全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因西乡代表未到会，仙居县委书记暂缺人选（因林迪生要求继续求学）等原因，会议决定：将原中共仙居支部改组为中共仙居县中心支部，领导全县党的工作，县中心支部由徐志任书记，林迪生任组织委员，王炳章为宣传委员，设址于城关土地堂朱寿喜家，并在马培安染布店（今解放街8号）设立交通站。同月，县中心支部召开全县支部书记会议，根据农民对“二五减租”的迫切要求，决定由农民协会带动群众开展减租、抗租斗争；并以手工业工人集中的县平民习艺所的细木工会为主体，发动工人开展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同时，为了在佃农和地主之间发生纠纷时，不使佃农吃亏，趁国民党政府建立“县佃业仲裁委员会”之机，指派马锦梅打入这一机构，争取其中的律师为佃农说话。由于国民党出面组织（实际上大部是由我党人员发动组织）的农会和工会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同志手中，夏秋之交，农村的减租、抗租，城镇的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轰轰烈烈，高潮迭起，形势很好。但此举背离了国民党挂羊头卖狗肉的本意，于是，国民党仙居反动当局惊恐万状，迫不及待地派出军警严密侦查我党的地下活动。8月×夜，对暴露身份的王焕忠进行围捕，王幸闻讯脱

险；接着，林迪生身份亦趋暴露，经临海县委同意于9月撤离仙居。此后，由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浙南特委和临海县委难以派员来仙指导。冬间，中心支部书记徐志改名应志春，报考国民党浙江警校（后脱党），中心支部的领导成员只剩宣传委员王炳章一人，全县性的活动难以继续开展，轰轰烈烈的减租、增资斗争受挫，党的活动也处于停顿状态。

1929年4月，中共中央鉴于浙江省委机关屡遭破坏，决定暂时取消浙江省委建制，在杭州、湖州、宁波、台州、温州、兰溪等6个中心地域建立中心县委，直属中央领导。5月间，负责筹建台州中心县委的曹珍（石瑞芳，时为黄岩县委书记）来仙整顿恢复党的组织。曹抵城关找到王炳章，听取了汇报。因此时县中心支部的负责人徐志已考入国民党浙江警校，情况复杂，有待观察，决定中共仙居县中心支部暂不恢复活动。此后，王炳章外出上海谋生，中心支部组织自行消失。曹珍离开城关后，在官路寺前万村找到“六中”党员万百川，经过考察，建立了以万百川为负责人的中共官路独立支部。同年夏，台州中心县委派员再来仙居城关，找到工人党员杨永彩，城关地区党的活动逐步恢复。秋间，台州中心县委根据“六中”党组织的报告，指派委员方林（曹廷祥）来仙居西乡，对原“六中”党员蒋树都、沈国祥、沈汉金等作了考察，11月复派朱渭宾前来，在西乡沙地村建立起以蒋树都为负责人的独立支部。1930年初，城关地区的党员恢复发展到50余人，建立了7个支部，东南乡也建立了2个支部，西乡在2个独立支部的基础上又建立了1个支部，这样，全县又恢复发展了110多名党员。经台州中心县委同意，成立了中共仙居（城区）区